

理性选择
与
组织的

行动决策研究

LIXING XUANZE YU ZUZH DE
XINGDONG JUECE YANJIU

王俊杰 / 王秀华 / 郭君铭 / 王英杰 / 时国轻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学科建设资金资助出版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 行动决策研究

王俊杰 王秀华 郭君铭 王英杰 时国轻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行动决策研究 / 王俊杰等著. —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 7- 202- 11335- 6

I. ①理... II. ①王... III. ①国有企业 - 企业管理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5865号

书 名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行动决策研究
著 者 王俊杰 王秀华 郭君铭 王英杰 时国轻

责任编辑 贺秀红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张 宽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名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7 000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202- 11335- 6/C· 348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 言 /1

理论基础：理性选择理论

- 一、理性与理性选择 /4
- 二、理性的迷狂压抑和非理性研究的兴起 /5
-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摆脱 /9
- 四、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15

研究设计

- 一、研究背景 /19
- 二、研究视角 /25
- 三、研究框架和基本概念 /27
- 四、研究方法 /31
- 五、本书结构 /34

研究个案概况

- 一、G公司的生产与组织 /35
- 二、G公司发展简史 /37
- 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 /44

国有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一、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 /50

2 ◇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行动决策研究

- 二、作为最终权力机构的股东大会 /56
- 三、作为决策机构的董事会 /61
- 四、作为执行机构的经理层 /65
- 五、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 /66

国有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分析

- 一、权力来源与权力获得 /70
- 二、股东大会的权力消长 /75
- 三、董事会权力的抑制 /81
- 四、经理层的权力扩张 /83
- 五、监事会的权力虚化 /87

国有公司治理：差异性运作

- 一、国资委的“超强控制”与“超弱控制” /90
- 二、董事会的行为失当 /94
- 三、经理层的行为偏差 /98
- 四、监事会形同虚设 /102

结论与讨论

- 一、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 /105
- 二、理性选择与组织的差异性运作 /107
- 三、研究意义与局限 /112

参考文献 /116

附录1 公司治理的理论综述 /126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35

附录3 G公司章程（节选） /175

引 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转向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租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管理科学化，企业内部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在出资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股份制、公司化改造，普遍改制为国有公司。国有公司拥有法律规定的独立财产权，真正实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全面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并形成了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中，股东大会由包括国家在内的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终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的法人财产，对公司重大事项做出决策；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具体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承担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职责；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专司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

但是，在实际的公司治理中，国有公司往往并不依照法人治理结构进行，出现了组织结构与运作的明显不一致，表现为典型的选择性：国有资

2 ◇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行动决策研究

产管理部门作为国有股权代表，在行政上对国有公司“超强控制”，以行政任命方式确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人选，随心所欲地占有、支配公司财产，完全无视中小股东和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而在产权上又表现为“超弱控制”，对董事会、经理层的决策、管理行为缺乏有效制约；董事长或总经理实际控制着企业的决策和经营，甚至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合谋，企业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激励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社会学家默顿告诉我们，研究者应该对生活中不期而遇、异乎寻常而又有关全局的社会事实给予充分关注，因为这往往可能是发展新的理论或扩展现存理论的研究契机^a。国有公司治理明显偏离既有的法人治理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第一，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产权主体。国有企业采取国家经营的形式，即国家政权机构及其代表，如厂长、党委书记、军代表等，直接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占有、使用和经营权力，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管理^b。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开，传统国有企业尚未形成市场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也不需要现代企业治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开始了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先后历经放权让利、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现在，国有企业全面改制为国有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国有公司治理与其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第二，在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分别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决策权、监督权和经营权，从而能够充分发挥团体优势，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同时也使各方权利相互制衡，其利益矛盾在公司治理框架中“内部化”解决，而不至于演变为公开的利益冲突和对抗。然而，国有公司治理却表现出典型的选择性，治理主体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失效。国有公司选择性治理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a默顿：《经验研究和社会学的理论》，载于米尔斯等：《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何维凌、黄晓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b因此，传统国有企业也称为国营企业。

第三，这个现象确实是事关全局的。国有公司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制造业，以及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经济主体。国有公司治理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而且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理论界关于国有公司治理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主要是借助于现代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探讨国有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现有成果以对策性研究居多，对国有公司治理的现实逻辑和内在机理缺乏深入、全面的探讨，还不能对国有公司治理与法人治理结构相脱离的现象作出完整解释。因此，建构一个能够很好地分析国有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十分必要，本研究力图在此有所突破。

理论基础：理性选择理论

本书以理性选择为基础，提出了差异性运作的概念，以促进组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

一、理性与理性选择

理性概念最初源于古希腊的Logos和Nous两个概念。Logos在古希腊语中本来是“词、言谈、叙述”之意，到赫拉克利特那里，它成了一个理性概念，是决定一切生亡存灭、协调一切人和事物的共同的法则。Nous最初的含义是“看”，阿拉克萨哥拉最早赋予它以“理性”含义，他认为Nous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性的东西，它决定万物并保持它们的秩序。可见，“理性”在诞生之初，是一种使整个世界、宇宙成为可能的客观性的规则和超越的理智。

近代以来，从尼采、康德、黑格尔到韦伯、胡塞尔等，都对“理性”有着深刻而不同的洞见，对理性的理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说，理性是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后，以推理方式，推导出结论的思考方式，是人类能够运用理智的能力。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理性思维，即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简言之，就是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力活动。

关于理性选择的研究，最早见于经济学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人的行动持理性的假设（即“经济人”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行动是一种理性选择，即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

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个人利益最大化是通过交易实现的，人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整个社会利益得以实现。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人”的假定，认为个体的行动决定是合乎理性要求的（即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个体能够获得完全充分的有效信息（即假定“完全信息”），个体根据所得到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和全面分析，从而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来选择决策方案^a。

理性选择是以“理性人”为基础，强调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概括来说，理性选择就是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二、理性的迷狂压抑和非理性研究的兴起

（一）理性的迷狂压抑

从古代理性概念源起，进而到现代理性的形成，科学和启蒙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科学的作用。科学的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开展，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的祛魅”（韦伯语）过程。科学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现代理性由三个因素构成：两个关于所要达到目标的理想，一个关于人的神话。第一理想是关于知识的，启蒙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便应运而生了。它们的使命就是揭示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真相，发现关于它们的知识，最终达到关于它们的永恒真理。第二个理想是关于实践的，

^a 参见丹尼尔·贝尔著，范岱年等译：《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汪翔：《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6 ◇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行动决策研究

启蒙希望普遍的人类解放，表现在现实中则是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第三个是关于人的神话，启蒙运动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启蒙运动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以现代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形成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人们所关注的作为现代特征的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现代性中受惠或汲取养分。即使我们所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现代性密不可分。

但是，无论把现代性看作是知识的更新与进步，还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性都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一方面是人的自我发现，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对个性的珍视，以及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和主体性的弘扬；另一方面是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生产要求的纪律、现代社会的秩序和国家机构的权威。现代性打破了过去的一切，但是又力图用普遍的理性重建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框架。由此，在现代理性带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便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方面享受工业化带来的富裕生活，一方面又经历了毁灭几千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兴高采烈地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乘坐喷气式飞机在全世界周游，一方面又不得不呼吸着已被污染了的空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每一个边远的角落都分享了繁荣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看到，一个小国的经济危机也会引发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面对着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许多学者亲眼目睹了理性美梦的破灭，“启蒙运动的玫瑰红正不可挽回地消褪”（韦伯语），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消极观念。针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的种种迷狂压抑，许多人文学科纷纷展开了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抗，表现之一便是对于“非理性”层面研究的关注。

（二）非理性的提升

具体而言，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因为离开了理性便意味着走向原始与野蛮；同时，人又具有非理性特征，人是有感情、有欲望、有意志、有信仰的动物。针对启蒙时代以来以理性观为核心的现代性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压制与忽略，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思想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个体体验与感受、意志、直觉

等非理性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把这些非理性因素与人的生命存在和价值联系起来。另外，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还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的潜意识、本能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在人类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总而言之，哲学和心理学中的非理性思潮几乎贯穿于20世纪文学、艺术、戏剧、音乐、诗歌、绘画、雕塑等所有文化领域。由关注理性到高扬非理性，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非理性作为人存在的一个方面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发生作用的？其发生作用的生理过程又是怎样的？非理性都包括哪些方面？

非理性是人的精神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同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一样，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一种或某些对象的直接反映。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大量偶然和随机的现象，这些偶然的、随机的现象具有无序性和无规则性，客观上要求人们相应运用无序的、无规则的、非逻辑的和非理性的认识方式，经过长期多次反复的操作，就会在人的精神属性中逐渐沉积和聚集许多非逻辑、无规则的、无序的非理性因素和内容。从某种角度看，客观世界的各种偶然和随机的现象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奠定了非理性发生和起作用的客观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非理性概念不能被混同于反理性概念，这二者之间是有明确区别的。“非理性是尚未进入理性思维层面的意识活动，既包括无意识的本能，也包括表现为感觉、知觉和表象的感性意识；反理性仅指无意识的本能，是低于感性意识层面之下的心理活动……非理性包括反理性，非理性的外延大于反理性。”

非理性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当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是由左右半球组成的，左半球主管语言、逻辑和时间观念，控制身体右侧的活动；右半球主管直观的、创造性的识别空间的能力，控制身体左侧的活动。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发生主要是以大脑的右半球作为其生理机制的，非理性活动包括无意识、直觉、情感、意志和感性等因素。

无意识又称潜意识，是非理性的基本内容。所谓无意识一般是指主体没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总和。简单地说，无意识是“未被意识到”的意识，如无意感知、无意记忆、无意表象、无意想象、无意注意和无意体验等。从大脑的神经过程来考察，强度较大的刺激

8 ◇ 理性选择与组织的行动决策研究

是形成有意识的生理根源，而强度较小的刺激是形成无意识的生理根源。同时，阈限上的刺激并不是完全同一的，虽然实际上达到了知觉的绝对阈限，但由于高级神经活动的诱导规律，强的特性知觉就抑制了弱的特性知觉。因此，这些弱的特性知觉就不能进入有意识中，而是成为一种无意识。

直觉是大脑的一种独特的高级功能。尽管现代科学还没有完全精确地揭示出直觉的生理机制，但现代脑生理学对大脑的网状结构和左右半球的研究结果已初步证实了大脑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为探索直觉发生的生理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人的大脑下有一个被称为脑干的部分，解剖学上将脑干上许多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细胞小集团和纵横交错的神经纤维网统称为网状结构。网状结构的功能之一，是依靠上行系统和下行系统来维持大脑的兴奋水平，使之保持觉醒状态或睡眠状态，调动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状态参与感觉意识活动。在直觉发生的渐进过程中，中断、顿悟以及从无意识状态向有意识状态的过渡，都与意识的觉醒程度有关，而意识的觉醒状态又是由网状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脑干网状激活系统正是直觉及其顿悟发生的初级生理机制。

情感的发生也依赖于一定的生理机制。一般来说，情感主要源于大脑皮层下中枢（丘脑、下丘脑、边缘系统和网状结构），大脑皮层控制着皮层下中枢的活动，调节着情感的进行。

意志活动是大脑皮层支配下的一系列随意动作所组成的活动，而随意动作是由大脑皮层的运动区和感觉区调节和控制的。人的意志不仅受大脑皮层的运动区和感觉区调节和控制，也受整个大脑皮层的调节和控制。同时，小脑和网状结构对意志活动的调节也起着重要作用。

总体来说，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现代社会野蛮和暴力的一面，认识到了当厌倦、无聊成为社会的普遍情绪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了现代人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危机感。同时，它还具有认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意义：理性思维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依据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思维方法；非理性思维则多用直觉、灵感，在理性思维无能为力的时候，非理性思维能使之“豁然开朗”。另外，非理性主义还从人出发，把人当作世界万物的核

心，关注人的个性、价值、尊严和命运，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它对人的意志、情感、直觉、体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作了深刻的揭示，同时探讨了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对人生理想和信仰进行了哲学反思。虽然其结论是消极和悲观的，但为人类进一步探求在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的处境和存在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过，非理性主义自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缺陷：非理性主义夸大了非理性的作用，在认识方法上强调直觉和灵感的重要性，同时还把意志、生命、情感、欲望、存在这些非理性因素本体化，建立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即以非理性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因而，非理性主义便无法真正解决理性和非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如何实现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和谐——既注重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又承认人的情感、意志、直觉、无意识等非理性的作用，便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摆脱

（一）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学以“理性人假设”和“自由市场假定”为根基，构建了一个雄视天下社会科学的经济帝国。这主要体现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在这本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宣言书”里，贝克尔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比其他方法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差异。”^a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

贝克尔的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多非议，其中最主要的看法

^a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是，如果考虑到社会层面的种种影响因素，理性选择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比如有严格宗教规范和正统观念的穆斯林社会，对理性就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标准。可以承认的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理性”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因此，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们很容易论证其学说可以运用到一系列广泛的、超越狭义经济领域的社会现象中。但是，由于他们只是把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简化为经济计算和交易的条件，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简化为自由社会的单纯性，因此经济学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便无能为力了，从而陷入了某种研究困境，这同时促使其对于自身的理论完善。

1980年代左右，经济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变革潮流，其主要方向有两个：一是拓展现有的狭窄研究领域，向邻近学科“出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是立足于现有领域中的疑难问题，从相邻学科中“进口”分析方法。前者比较著名的便是上述贝克尔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后者比较著名的则是以威廉姆森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以阿克洛夫为代表的PSA经济学（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及以卡纳弗为代表的心理经济学方法。相对前者而言，后者走的便是一条经济学自身理论完善之路，其中比较典型的要数阿克洛夫。阿克洛夫认为，从心理学上讲，有的人可能做事很有目的性，行为是最大化了的，而有些人则可能并不会对事情做出“最大化”反应，尤其是进入某种特定环境后更是如此。心理学家也根据自己的实验，发现人的决策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完全理性”只不过是人的行为的理想描述，实际上，它和人的实际行为相差很大。进一步的心理学实验又发现，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更多的是基于直觉而非最大化，一般都是有了一个参照目标之后，再逐步进行调整，所以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些实验结果都与经济学家“完全理性”和“理性预期”的信念完全冲突。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情感

“情感”是感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基础。在当代社会，随着非理性主义思潮对非理性的高扬，社会学也开始从情感角度对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梳理，这种梳理本身便体现了社会学对于情感的关注。从情感角度，

传统社会学家对情感的研究一一明晰。社会学的诞生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产生的，在这种工业化的背景下，许多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都极力赞扬社会的“理性化”趋势，也即对于个人情感进行控制的必要性。韦伯曾就情感控制的合理性展开过论述，他提出的“合理化”理论有力地证明：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是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因素。韦伯强调理性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因为情感、情欲与资本主义的科层制、劳动组织方式以及资本积累的要求存在相悖关系，而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与天职观（按照韦伯的说法，天职观的含义是，劳动是上帝所赋予的职责，无论进行何种劳动，都必须完成上帝所赋予的这项职责）恰恰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就是说，没有对情欲的抑制，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发展越处于高级阶段，情感因素就越让位于理性因素。于是，情感就成为一些社会学家分析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界限的一个重要指标：早期的组织是情感的联合体；理性的社会是文明的联合体。涂尔干也认为，文明正逐步朝着理性化和逻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了明显的事实。

不过，也有一些后现代的社会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虽然现代文明的进步是建立在压制情感的基础上的，是在压制过程中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压制就是合理的，恰恰相反，对情感的压制是现代性的一个缺陷。罗斯指出，启蒙理性的失败有几个原因：它剪断了想象的翅膀，限制了情感；曲解了社会的冲动，忽视了人类本性中热情奔放的一面，因而不能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内聚基础。

弗洛伊德也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对人类情欲的压抑史，这种压抑到了文明时代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文明对爱欲的压抑，使得人们对现实生活难以忍受，幸福难以获得。

马尔库塞把压抑分成基本的和剩余的，认为在物质匮乏条件下，基本压抑是必要的，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情欲的压抑就变得多余了。拯救文明，将包括废除文明强加于感性的那些压抑控制。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代表福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理性压抑人性的结果是制造了“疯狂”，疯狂这种病态情感是与理性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人的存在分裂为职业领域和私人领域，职业成了影响人们情感行为的主要因素。人们的私人感情生活一步步被排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甚至后台，人们的情感随着职业类型而变化，警官的严厉、护士的温柔都可视为是履行职责，这种社会职业分工对情感的死板要求便导致了情感的异化。另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任何东西都纳入了市场交换，都成为了商品，情感也不例外。在现代社会，情感愈来愈失去了其本真性，成为市场操纵的对象。

应当指出的是，情感控制的研究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在同一思想家那里也存在矛盾的看法。孔德基于实证主义立场是坚持排斥情感的，但他又强调道德情感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晚年更是把宗教情感视为治理社会的良方。韦伯的理性情结虽然根深蒂固，然而，他的人文主义倾向使他对理性主义统治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危害深感忧虑，批评科层制是束缚现代人的“铁的囚笼”。马尔库塞虽然反对情感控制，但他又承认“本我”具有破坏性，他批判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又看到了在人的情感满足与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反向关系：压抑越大，则文化越发展。这种状况本身就表明了人的情感的内在矛盾和张力：情感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困境：理性化对任何一个社会正常有效的发展都是必要的，然而一旦实现了理性统治，人就会深深陷入社会规则和制度的网络之中，人的情感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要走出这个困境，显然必须在理性化与情感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争论

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亚历山大指出，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a

^a Alexander, J. C.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Press. 1987. P10.